

一 齐鲁诗教之源——东夷文化

中华文化的发展壮大，是由多元形成的。在中华辽阔的大地上，最初有许多民族部落散处各地，随后因地理的原因出现了几个中心，大约在四千多年之前，其中有三个地区的成就和影响最大，都是依据其居住的地理条件形成的。

中国古代的地理概念，是以大山大河为坐标的，即是列入历代王朝祀典的神山圣川，号称五岳四渎。先说四渎，即河（黄河）、济（济水）、淮（淮河）、江（长江）四条通海的大河。在这四条大河的流域，诞生了三大集团，即西部的河洛（黄河、洛河）流域孕育的华夏集团、东部的济淮（济水、淮河）流域孕育的东夷集团、南部的江汉（长江、汉水）流域孕育的苗蛮集团。三者以东、西两集团开化较早，南部的苗蛮只是到了商周之交才发达起来。三者互相交流、争斗，逐渐混而为一，迭次出现了所谓“三代”的夏、商、周王朝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昌盛的整体。

这三代王朝，夏朝和周朝是以河洛文化集团为主导而形成的，只有商朝是由淮济文化集团为主导的；而周朝又是在商朝之后，经春秋战国直接孕育了秦朝的。从地区来看，如果加上秦朝的话，有三个王朝是华夏集团建立的，只有商朝是东夷集团建立的。因此，华夏一词便成了我国的共同称号，华夏大地、华夏文明即中国大地、中国文明。

江河流域，面积广阔，涵盖的地域最大，但却因或改道，或涸竭而变动不居，但是大山却岿然长存，供人瞻仰，这种伟大而固定的坐标容易成为人们崇拜皈依的对象，古代的五岳就是华夏民族的神山。五岳的名称是逐渐形成的，东周以前只有四岳一词，战国后五行学说盛行，学者们往往把各类事物凑合为“五”数，四岳于是变为五岳。但是五岳实指的山名也因时代而变化，如南岳、北岳就有变化，只有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是稳定不变的。这三座山在文献中最早被定为神山的是泰山，最早的史籍《尚书·尧典》虽有“四岳”名称，但具体指的山，却只有被称为“岱宗”的一座泰山。最早的字典《尔雅·释地》说“中有岱岳”，《淮南子·地形训》说“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证明泰山名为“五岳之尊”是有来历的。泰山处于济水与淮水之间，其周围土地肥沃，盛产食品（五谷）和衣服的材料（桑麻）故而形成了泰山文化圈。在泰山南北大致

北至济水（当时它尚未消失，其河道未被黄河侵占），南至淮河（最早是指潍河，夏商以后才指现在的淮河），西至黄河（当时黄河由豫东而北上至秦皇岛一带流入大海），东至海洋，是夷人居住的地方，因居东方，被华夏集团称为“东夷”。

东夷集团居住地，包括现在山东省及其周围地区。这地区很早就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大汶口文化产生于六七千年之前，已有了陶器、农畜业和丝织品，并且有了文字的雏形。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不仅有了更精美的陶器，而且有了冶铜工艺，有了占卜的甲骨和原始的文字，更有了城堡的出现，说明国家出现，已充分进入了文明阶段了。在龙山文化时期，今山东地区诞育了一位圣王大舜。大舜生于诸冯（今诸城），耕于历山（今济南），渔于雷泽（今菏泽），作什器于寿丘（今曲阜），陶于河滨（今豫东），最初活动地几乎是今山东全境。其后他又进入今河南一带，在逢泽（今河南开封）遇上了华夏集团的领袖尧，当尧把王位禅让于舜时，体现了中华文明东西两大集团合而为一，形成了以华夏为称的统一的伟大王朝。

大舜的苗裔为商族，在夏朝之时活跃于原东夷地区（即今以山东省为基地的周围），并西跨黄河以西，直至灭亡了夏朝建立了商王朝。其后兴起于西部的周朝灭商，分封诸侯，今山东地区是被特殊注重的地方，摄政的周公把长子伯禽分封于鲁，把周朝的军事

统帅尚父（俗称姜太公）分封于齐。今山东省一带除了保留一些殷朝遗留小封国外，重要地区都分封给了周朝的贵族大臣为诸侯国，以坐镇东方，其中以齐、鲁为最大，最强盛，文化水平最高。

至今人们仍习惯称山东省为“齐鲁之邦”，并以“鲁”为山东省的简称。

二 从虞舜、商、周到鲁国 孔子的礼乐传承

在上古时，东夷文化水平是较高的。东夷领袖大舜，据《书经》记载是礼乐的倡导者，他制礼作乐，并且和身边的大臣唱和作歌，互相勉励。他命夔专管文艺，据《舜典》记载：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应该是古文献著录的我国最早的文艺理论。其后，夔为舜创作了优美的《韶乐》，甚至流传到近两千年后，孔子在齐国观赏到的时候，陶醉得竟至“三月不知肉味”。当时所谓乐，是包括音乐、舞蹈和诗歌的综合体。《尚书》大约编定于春秋时代，大舜对乐的论述，应是古代史官得自传闻然后著录于简牍之上的，不一定十分准确，但是流传有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夷文化之高水平。大舜的后裔活动于豫鲁一带，后来建立了商朝，亦称殷朝。史称惟商王室“有典有册”，从甲骨

文来看，殷商的撰写典册是很成熟的。现今的山东省区，是殷商的发迹之地，商王朝建立以后，又是它的后方基地。虞朝的大舜留传的制礼作乐传统，在周初由周公旦继承下来，经过修订而发扬光大了。鲁国是周公旦的嫡长子伯禽的封国，周廷的礼乐设备分了一半赐予鲁国。因此，在西周王朝崩溃之后，文物散失，鲁国就成了商周宫廷礼乐文献的继承和保存者。列国的大臣，查阅资料都要到鲁国来，例如，公元前 540 年，在晋国执政的韩宣子到鲁国进行访问，他得以“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见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见《左传·昭公二年》）其实早在四年前，即公元前 544 年，吴公子季札聘问鲁国时，他就要求“请观于周乐（按：“周乐”指周王朝宫廷乐队保留的天子专用乐舞的节目），于是鲁国宫廷为他举行了歌舞表演会。演出节目分两大类，一是歌，二是舞。歌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等国风，以及《小雅》、《大雅》和《颂》几乎《诗经》中的各类体裁都听了。其后鲁宫乐工们又为他表演了夏、商、周三代的乐舞代表作，最后，他“见舞《韶箛（箫）》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帟（覆盖）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无）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请注

意，季札到鲁国观乐的时候，孔子才七岁，当时鲁国宫廷中已保存了《诗经》的全部内容了。

我国古代乐舞文献，东周以后保存于齐鲁两地。虽然《韶箭》曾为季札表演过，但是孔子却直到成年之后，才在齐闻《韶》的。这大概是因为齐国的权臣田氏（亦写作陈氏）是大舜的后裔，特意保存下的。可惜山东地区的文艺传统文献只有《书经》保存了一些，后来夏、商两代由于政治中心的西移，散失了不少。周代由于鲁国的特殊地位，才得以把《诗经》保存下来。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之际，伟大的孔子（前 551—前 479 年）崛起于东方，他以继承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好古敏求，终身进行教育事业。他曾自豪地说：“（周）文王既歿，文不在兹乎。”他的教材经其门弟子整理传授，形成了五经：《书经》、《诗经》、《易经》、《礼记》、《春秋》流传于百代万世。

孔子对于《诗经》是经过修订的，他曾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汉代的经生曾说古时诗歌存有三千篇，孔子删存了三百篇，这是靠不住的。当时《诗经》单称为《诗》，亦可称为《诗三百》。儒家的反对派墨家曾批评道：

儒家诵《诗三百》 弦《诗三百》 歌《诗三百》 舞《诗三百》。

指出孔子师徒‘弦歌鼓舞以聚众’（《墨子·公孟》）
《诗经》本来就保存了三百首，可见孔子并没有删诗。
孔子经过宫廷乐师的传授，又将其作为雅言（周代普通话）的教材来教给弟子。他的弟子说：“（孔）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幸而有了孔子才把宝贵的传统文献保存传授，为中华文化的命脉做了伟大的贡献。即以《诗经》而言，它就保存了春秋以前山东地区的诗歌作品。

三 儒家与诗经

儒家传习的经典中，从尧舜到夏商，除了《尚书》中记载的舜与大臣在朝廷之上作歌互相警戒勉励的“唱和诗”之外，诸子杂史及《周易》爻辞等亦有著录者，虽为数不多，但大都不是依托之辞就是只言片语，不成篇章。我们只能认为从虞廷赓歌之后，直到西周以前，诗歌基本失传。若不是孔子特别注重诗教（墨家认为搞文娱活动是浪费财货与精力，法家视诗歌等文艺为害虫，道家则认为声色之事令人目盲发狂，均持反对仇视文艺的态度），若非儒家传下了《诗三百》这一文化珍宝，真使中国诗歌传统趋于灭绝了。《诗经》对于中国的诗歌传统具有根基的巨大作用，是后代无数杰出、伟大作品的原典，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诗经》现存 305 篇，分为国风、雅（小雅、大雅）、颂三部分。另外有六首仅存题目，据说有曲调没有唱词的“笙诗”，而其乐谱亦失传。现就风、雅

颂三者简述如下：

风——包括南二种（周南、召南），南是指的江汉一带（楚地）的地方曲调。周南是周公公府中保留的诗篇，召南是与周公共同辅佐周室，分陕而治的召公公府中的诗篇，其诗句有南调的原词，也有依南调而填写的新词。其歌词内容所涉及的地域有黄河、长江、汉水、汝水、南山（终南山），说明这些作品是来自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最后经乐师混编而成的。二南共二十五篇。另外还有十三国（诸侯国、封邦）的诗歌。但是所列“邶、鄘、卫”三国，其中邶、鄘二地的诗歌已失传，而卫国（今河北、河南省一带）继承两地的曲调，并利用其曲填词，加上卫国当地民歌，保存的篇章最多，乐师为传授方便，把卫国的用二地曲调的作品分配到邶、鄘二部分中去。其次为王风（东周首都洛阳一带）、郑风（今河南）、齐风（今山东东部）、魏风（今山西省芮城附近，春秋时为晋国所灭）、唐风（即晋国的前称，今山西一带）、秦风（今陕西）、陈风（今河南安徽一带）、桧风（今河南省密县一带，春秋初灭于郑）、曹风（今山东省西部菏泽一带）、豳风（原为周族发祥地今陕西邠县一带的曲调，由鲁国继承，多填以新词）。风，是指曲调，犹如当今所谓“西北风”、“秦腔”、“河南梆子”、“昆曲”、“京剧”以及“新疆民歌”等。这十一国风的区域，大体是以今河南省即中原之地为中心，西至陕

西，东至黄河流域与山东半岛一带，其中也涉及到江、汉流域，共保存诗歌 135 首。国风是周代的诸侯与王室乐师演唱的歌词，反映了当时婚嫁、宴会和祭祀等礼俗生活，也即儒家所谓“礼乐”，在日常礼仪中所使用的唱词。其来源大都是氏族传统的礼俗乐歌以及各地的民歌，其间自然经过乐师的加工，后来又经过孔子的修订，但还是有些民歌原词保留下来了（经粗略考察，大体保留民歌面貌者约有七十来首）。国风的写作时间，最早可以上溯至殷商，最晚写作于春秋上半期，主要是周朝作品。

雅——所谓“雅”，即“夏”的古代同音字，雅就是夏。“夏”在历史上既是王朝名，又是地名（所谓华夏）当时泛指中原（今河南省为中心），《诗经》中的“雅”，是指用夏调和夏言（即雅调和雅言）所表演的乐歌。雅言，既是夏言，又是当时通用的语言（犹如后世的国语、官话、普通话）。雅分大小雅，其作者多是乐师或士大夫。大雅，有诗歌三十一首，是西周作品。小雅，有诗歌七十四首，大多是东周作品。

颂——所谓“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也”。“形”指肢体动作，“容”指面部表情，即舞诗，是在庙堂举行典礼表演舞蹈时所歌唱的。颂共有三部分：周颂（周朝宫廷乐舞）；商颂（周灭商后，封其后裔于宋，今河南地），此是宋国宫廷演出的颂诗，其中保留了

自商代流传下来的成分；鲁颂，周公嫡嗣伯禽的封国，特许它备天子礼乐，其首都在今山东曲阜。三者共保存诗歌四十首。

《诗经》的全部，都是鲁国宫廷乐队的演奏保留节目，孔子是从鲁国乐师处承传，加以修订，并作为教材以授其广大弟子的。从此，它由官府专业人员的手中普及到士庶人们，并作为儒家的经典，流传于后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将《诗经》作为鲁国作品，也是可以的。汉武帝独崇儒术之后，《诗经》成为官府专门之学，并专设博士主管传授。当时，有齐人轅固生传授的齐诗，鲁人申培传授的鲁诗，燕人韩婴的韩诗三家学派行世。这些说诗大师主要是齐、鲁两地人，另外还有燕国人，三地均在华夏东方。以上三家都以今文（汉代文）著录其教材，故称今文学派。其后又有所谓以古代（周代）文本自称的新学派——古文学派，即由毛亨和毛萁传授的“毛诗”兴起，于是《诗经》的传授就有今古文师说的不同。汉代讲授《诗经》和其他儒经成了待遇优厚的一种官职，所以其岗位的争夺很激烈，由各自学派的大师把持着，并置有门生籍录，不经学派的掌门人认可，是无由入门的，因而造成学生谨遵师说，不敢背叛师门的僵化学风。各派都固守旧说，不交流，不改进，遂使经师养成了敢于以“祖传圣言”蒙骗学生，信口胡说的局面。古文派后起，这个学派比今文派的眼界要宽，他

们同时推出的《春秋左氏传》和《诗毛氏传》两书，在诗歌的背景上与诗义的阐释上互相配合，彼此依证，并且撰写了《尔雅》，在字义的训诂上予以注解，于是增强了说服力。古文家在自己编订的几部经典的集体效应下占了上风，因此唐代朝廷在编撰《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范本时，独取毛诗而排斥今文三家。但是毛诗虽比今文三家较为通达一些，但仍然不脱经师的不懂装懂、连骗带蒙、信口开河的习气，因此不能满足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子，直到宋代朱熹的《诗集传》出现，才开始对汉儒的学说予以清理，虽多所辨证，但仍未全部廓清。五四运动之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闻一多和冯沅君等，才以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对《诗经》进行探讨，把汉儒，特别是《毛诗》的乌烟瘴气基本上予以廓清。在此基础上，本来可以出现一部以现代学术观点与方法整理注释的《诗经》，但因日寇侵华后的连年战乱未能出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虽也有学人有新著作问世，但因受各种政治运动反复的干扰，以及极左思潮的影响，这些著作到了今天，其观点因随政策的变更已经过时，难以袭用了。如今，我们研究《诗经》，对于这种状况应该知道，而且也不能不在“五四”以后的新史学派的成果基础上，重新审视，独立思考，小心求证，才能认识《诗经》的本来面貌和客观价值。

四 海岱古调，齐鲁清风

——周代山东地区诗歌鸟瞰

从上文所说，《诗经》是由鲁国的乐师保存下来，又经孔子修订过，成为儒家经典而传流后世的。汉以后解说《诗经》的今文学派又是鲁国的申培和齐国的辕固生，于三家中占了两家。古文派的《毛诗》，由鲁人毛亨所传，到了后汉时期又经高密人郑玄为之笺释，可以说与山东有很深的渊源。《诗经》的作品中间著录了许多山东作品，就是理所当然的。区分十五国风的作品是很容易的，但是大、小雅中作品的产地就很难分辨了，目前我们从中仅找出有根据判定为谭国（后为齐桓公吞并，原址在济南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附近）作品的《大东》一首。

〔小雅〕——山东是上古少昊氏之丘，爽鸠氏之野，即后来《书经·禹贡》所谓“海岱惟青州”之地。在此以泰山为中心，西依湖泽，东临大海的地区内生活着高大善猎的夷人，因居华夏东部，亦被称为东

夷。各地每个氏族部落都有其史诗，东夷流行的史诗已经失传，仅从古籍记载中可以想见此最初诗歌的片段而已。《大东》是《诗经》保存的东夷地区最早的诗篇，已脱离了史诗乃至民间说唱阶段，是士大夫的创作了。之所以用“大东”标题，由于本诗中有“大东小东，杼柚其空”的句子。周公东征之后，政权统一，定其发祥地周原之丰、镐故邑为宗周，定洛邑为成周，作为行政之首都。以洛邑为中心，视今豫东、鲁西一带为“小东”，视今山东半岛一带为“大东”，颇与现今所说的近东、远东相似。据汉儒各家的说法，都以为本诗是谭国大夫的作品。谭国是殷商时期的诸侯国，地址在今济南市东郊龙山文化遗址附近。它于公元前 684 年被齐国吞并，本诗的写作时期当在此之前，今文家以为是周厉王时期，古文家以为是周幽王时的作品，盖因为本诗内容揭露周王室赋敛之重，注解者故意避开周朝创建时圣君贤相特为之隐讳，而把时间拉到西周亡国之君的时代。根据诗意，此诗正值公元前十世纪前，周公经营洛邑之后，又修筑辐射四方的大路（周道）通行之初。汉代王符《潜夫论》所说“赋敛重而谭告通”，即指谭国大夫写的《大东》所反映赋敛重的讯息才通达到周王室的。本诗前半直叙东、西方之劳逸不均，待遇不公，下半则将人间政治矛盾以丰富的想像夸张，转为天上星辰。所谓“维天有汉，监亦有光”，以银河为鉴：织女星

不织布，牵牛星不驾车，启明星、长庚星（金星之早晚二名）从早到晚监视黄道（比喻周道），而毕宿（属金牛星座）则作捕兔网的形状，在黄道之上网罗民财。诗中尤以“有冽洿泉，无浸获薪”为喻，无意中露出济南泉水众多的特色。谭国大夫作此诗当在周初建周道之时，当是济南最早的诗人，早于李清照两千年而闻名于世。《大东》应属于政治讽刺诗，它是在史诗、情歌之后而晚出的体裁，而且它已脱出了没有具体作者的社会集体传诵阶段，是当时诗歌中的创新之举。它虽晚于史诗，但是其想像力之活泼，比喻意象的生动，又与东夷神话（从《山海经》等古籍反映已佚史诗之梗概）的表现特色相同，洵为“三百篇”中的上乘佳作。

〔齐风〕——《诗经·国风》存齐风十一篇。齐国首都在临淄，是山东半岛的一座繁华的都会。这里原是东夷人生活的地方，夷人身材高大英武，心胸豁达而多智。姜太公于周初来此建立齐国时，对于本地土著采取因循故俗的宽松政策。姜姓氏族原是与周人姬姓氏族互为婚姻的，当周人伐殷商时，太公作为周武王的“尚父”加入了军事联盟，在指挥作战时立下大功，因此他率领族属被分封到“大东”之地的齐国。姜姓氏族与姬姓氏族风气有所不同，因以农业为主而形成了周氏族的庄重勤勉，因以牧业为主而形成了姜姓氏族的活泼勇敢，两者各有特色。特别是周公当政时

的制礼作乐，加强礼制，太公作为其戚族的长辈没有凛遵照办，其部属尚保留了灭商以前的习俗。太公到了夷人聚居的齐地之后，与以渔猎为主的夷人相处。牧人与猎人习性基本相似，他们乐得因其故俗，无为而治，很快就和夷人融为一体，建立了东方最富有进取性的强大的齐国。因此齐国的诗歌富有东方特色，也因而被周王朝的主流思潮轻视。儒家讲授的《乐记》（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毛诗》的《大序》袭取了它的基本论点）中曾记述孔子弟子卜子夏的话：“郑音好滥（美好过分）淫志，宋音燕女（燕婉）溺志，卫音趋数（节奏快速）烦志，齐音敖辟（高亢新奇）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礼弗用也。”所指宋、卫、郑、齐都是殷商王朝的故地，被崇奉周礼的儒家贬斥是当然的，即使宽容博取的孔子也说“郑声淫”，要“放郑声，远佞人”。我们想见煌煌大国之齐风，仅存十一首，应是被鲁国宫廷乐师删除之后而保留的较平稳的尚可被周人接受的特色不强的作品吧。即使如此，现存齐风仍散发出一些夷人氣息。但是注释《诗经》的汉儒却一味地强调《乐记》所规定的诗歌的教化讽刺功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以达到上下交流的政治效应。汉儒以短浅的眼光，把诗歌简单地视为政教的工具，“学了就要用”，恨不得“立竿见影”，于是他们不惜牵强附会，歪曲诗意，对于文本肆意牵合礼义而误导读者，今